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

十六讲

周振鹤——著

中华书局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 十六讲

周振鹤——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周振鹤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12

ISBN 978 - 7 - 101 - 09714 - 6

I. 中… II. 周… III. 政治地理学 - 研究 - 中国 IV.
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7766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
| 著 者 | 周振鹤 |
| 责任编辑 | 余佐赞 贾雪飞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
| 印 数 | 1 - 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714 - 6 |
| 定 价 | 48.00 元 |
-

前言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这样的学科分支对一般人而言似乎比较生疏。简而言之,这是从地理学缩小到政治地理学,又从政治地理学缩小为历史政治地理,再从历史政治地理缩小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不断地缩小研究题目是做学问的要义之一,而学科分支的增多又正是学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在许多学术领域中,研究越来越趋于专门化。地理学算是传统的学科,不过在中国独立成一门学问也并不早,只能追溯到晚明,此前一直只是历史学的附庸。政治地理的概念是舶来品,最远或可以溯源到康德,成为一门学科则晚至1897年拉采尔的提倡。在中国则至迟1902年以前就输入这个概念了。但可惜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政治地理学来,最多只是对西方这门学问的介绍与评论,而实质性的研究则很少。最近谈论地缘政治学的人又多起来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政治地理变异而来的一门学问,由于被纳粹德国所利用而臭名昭著,牵连到政治地理学一长段时间内也少有人触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地理学在西方复兴,20世纪末,地缘政治学也重新登上舞台。简而言之,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政治学,是地理视角的政治学,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是地理学,是政治过程的地理学。但在中国,这两方面的研究至今都还未成气候。于是我想,我们不妨从具体而微的事做起,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这一丰富资源,从中发现历史时期政治过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提炼出自己的政治地理观点来,以体现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中国面貌。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思考并写出了一本小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书,即《体国经野之道》,想要破译的就是政治地理这个“道”。

我曾在那本书内地版的序里说到,该书其实就是一本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导论式的著述,但因为没有将政治地理的所有方面都涉及,所以当时不用历史政治地理导论的名字。现在这本书则是在该书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不仅仅是原来章节内容的增补,而是讨论研究范围的扩大。原来的讨论集中于行政区划,通过微观与中观的分析来看出行政区划变迁的各个方面所蕴含的政治地理含义。此后,我又从中观的视角讨论行政区划以外的政治地理问题,陆续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历史地理》辑刊和其他刊物或会议论文集集中。当然还有一些研究只停留在学术报告里,尚未整理成文。因为体系还不够完备,所以仍然不想将这些文字与《体国经野之道》整理成一本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概论的专著,又由于所有这些写出来的东西都曾在博士研究生班上讲过,所以暂时定名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以待将来的充实与体系化。

历史政治地理与一般的政治地理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研究方法是历史学方法为主,研究对象也是历史时期的政治地理现象,因此有较浓的历史学分支的味道,而在实际上,历史地理学在大学的学科分类中目前正属于历史学而不是地理学的二级学科。所以,如果说,历史政区地理著述,如《西汉政区地理》一类有点类似技术史学的意味,那么这本书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或许可以看成是诠释史学的一种尝试。

就目前而言,对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还没有出现,这就算是粗糙的第一本吧,但我希望后来者能够因为我的带头并不见得出色,而奋起写出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概论来,那么这本书所起的药引子作用也就达到了。由于近十来年所写的政治地理论文有些是在不同场合下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故少数文章间或有重复之处,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调整合并,以便阅读。同时,个别论文在收入此书时,标题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调整,谨此说明。

周振鹤

2013年4月20日

目 录

前 言 /1

-----1—24

第一讲 范式的转换——从沿革地理、政区地理到政治地理

一、行政区划史的研究 /4

二、从历史政区地理到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 /16

三、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 /22

-----25—40

第二讲 政区地理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

一、行政区划的定义 /27

二、行政区划诸要素的概念 /29

三、行政区划的相关概念 /32

四、其他与行政区划有关的概念 /34

-----41—70

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

一、《禹贡》的两种政治地理思维 /46

二、边疆区与内地的圈层型关系 /50

- 三、特殊政治区的类型与功能 /53
- 四、跨高层政区的特别政治区 /58
- 五、地方分权偏重时期的政治地理 /63

-----71—96

第四讲 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的关系

- 一、古代对自然地理区域的认识 /73
- 二、《禹贡》的地理区划 /78
- 三、秦郡的自然地理背景 /82
- 四、唐代十道的地理区划 /84
- 五、元代行省与地理区域的脱节 /90
- 六、结语 /94

-----97—118

第五讲 从分土而治到分民而治

- 一、行政区划的由来 /99
- 二、县制起源三阶段说 /104

-----119—138

第六讲 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三循环

- 一、行政区划的层级与管理幅度 /121
- 二、二级制向三级制转化的第一循环 /121
- 三、二级制向三级制转化的第二循环 /125
- 四、从多级制向二级制简化的反循环 /130
- 五、小结 /134

-----139—164

第七讲 行政区划幅员的确定：百里之县、千里之郡与万里之州

- 一、政区幅员的尺度 /141

二、“百里之县”幅员的相对稳定 /142

三、“千里之郡”幅员的缩小倾向 /145

四、“万里之州”幅员的起伏变化 /149

五、赘言 /161

-----165—182

第八讲 行政区域划定的基本原则：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

一、政区边界的概念 /167

二、山川形便原则的运用 /169

三、犬牙相入原则的萌芽与发展 /172

四、犬牙相入原则的极端化及肥瘠搭配原则 /176

-----183—200

第九讲 行政区划地理分布的变迁

一、行政区划的置废分合 /185

二、古代经济重心从北到南的转移 /188

三、南方和北方政区分布密度的逆转 /190

四、东南地区经济发展与政区分布的关系 /192

五、移民和政区置废与分布的关系 /193

六、交通路线与政区分布 /195

七、非经济因素对政区分布的影响 /197

-----201—214

第十讲 行政区划变迁中的文化因素

一、政区和数的关系 /203

二、政区与宗教的关系 /205

三、行政区与文化区的契合 /207

四、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210

-----215—228

第十一讲 行政区划的等第变化

- 一、县级政区的等第 /217
- 二、统县政区和高层政区的分等 /221
- 三、政区分等的意义和作用 /225

-----229—244

第十二讲 军管型的特殊政区

- 一、两汉魏晋的都尉 /231
- 二、汉唐的都护府 /233
- 三、北魏的镇戍 /234
- 四、明代的都司卫所 /235
- 五、唐代羁縻府州与明代羁縻都卫 /237
- 六、军事因素对于行政区划的影响 /239

-----245—260

第十三讲 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背景

-----261—278

第十四讲 主流的大陆意识与非主流的海洋意识：历史中国海权的缺失

-----279—302

第十五讲 政治地理视角下的中央地方关系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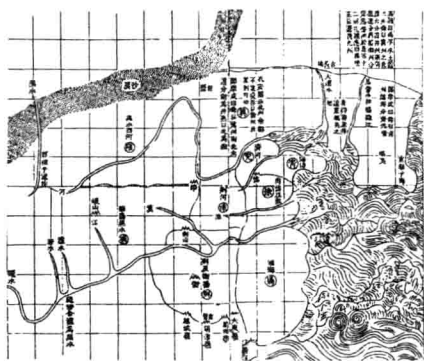
- 一、历代中央地方关系变迁过程 /281
- 二、外重内轻还是内重外轻——中央地方关系变迁的阐释 /298

-----303—326

第十六讲 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

【第一讲】

范式的转换——从沿革地理、
政区地理到政治地理



就现代学科的形成而言,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甚至是至今还没有完全定性的学科。在中国最先提出“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创办的《禹贡》杂志,但却是以《禹贡》的英文名称 Historical Geography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可是其时的《禹贡》主要还是研究传统的中国沿革地理的学术刊物。所谓沿革地理,主要的研究是两大部分内容,一是疆域政区的沿革,一是河流水道的变迁,实际上还带有很浓厚的历史学的分支性质,前者与疆域政区沿革史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国外,历史地理也出现得很晚,而且学科性质也存在游移现象,有的认为历史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有的则认为它是历史与地理的接合部。

虽然《禹贡》杂志基本上还是沿革地理的研究模式,但也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地理学的雏形开始出现。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历史地理的学科性质基本上已经定讞,那就是将其定义为是地理学科的一个分支。认为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以区别于人类出现以前的古地理以及当代的地理。因此地理学科所有的分支在历史地理学中也都应同样存在。也就是说历史地理学中也应该有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两大分支。而在历史人文地理中又应该有次一级的分支,即历史政治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之分。而在历史政治地理中又可以更加细分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疆域地理等等。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手段主要是历史方法,因此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及地理学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表现在学科性质有点近似于历史学的分支,研究者如果没有历史学素养,就很难在这一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所以今天教育部将历史地理当成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来对待,也有其一定原因,虽然从根本上讲并不合理。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在中国,由于历史学的发达,对于史学的各个侧面与分支都有长远的研究史,其中对政治史的研究尤被重视。行政区划变迁的内容与政治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对行政区划变迁史的研究也历来受到注意。因而历史政治地理的前身不但是沿革地理,而且实际上还是沿革史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如果要研究政治地理的发展过程,必须从行政区划沿革史说起。

一、行政区划史的研究

1. 行政区划沿革史的研究

如果我们对这一研究过程加以回顾,大致可以依据研究内容的发展,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史料编纂。

可以说,自从行政区划出现以后,有关其变迁情况,诸如置废分合等记载就成为史书的内容之一,在《左传》、《史记》等重要史籍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古代史籍之所以重视政区的记载是因为政区实际上是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职官的任命是以行政区划的存在为前提的(也有个别的例外),这就是《周礼·职方》所说的“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顺序。但起初有关政区的记述都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还算不上是一种研究。《史记》虽有八书之作,但其中有天官而无地理,甚至连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这样的大事,也只是一句话带过,而不罗列三十六郡之名,致使后人至今聚讼纷纭。到了班固修《汉书》的时候,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班固把西汉末年的政区面貌,以《地理志》的形式相对完整地记录下来,使后人得以对该时期的政区地理格局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历史编纂家的这个创造,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但其时能够意识到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框架,容纳西汉时期其他地理内容(例如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在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方面已是一个质的飞跃。更何况在《汉书·地理志》中,已经用简单的语句来叙述郡级政区的沿革以及部分县级政区的由来,这已经可以算是一种研究了。班固《地理志》的编纂显然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楷模,因此在《汉书》之后,相继有十五部正史模仿其体例,也写出了自己的《地理志》(或

上的政区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其中最出色的学者是钱大昕,在他所著的《廿二史考异》中,对各正史有关政区变迁记载的匡正,大都是独具慧眼、发千古之覆的重要研究成果。他的研究虽然大都是个案式的,但却为整体的政区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类似钱氏成就的学者虽然凤毛麟角,但都或多或少起了拾遗补阙的作用。当然清代也有些学者虽然有名气,但在沿革地理考证方面其实成就不大,有些研究甚至是错误的(譬如王鸣盛),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第三阶段是整体复原研究。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即:

(1) 历代大势的研究阶段

差不多在考证订讹的同时,就有学者开始从事综合研究,即以已有的史料为根据复原史籍上未曾记载的政区面貌。例如,对秦始皇三十六郡的研究就引起一股热潮,清代不少学者经过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这是综合研究的典型尝试。与此同时,还有些学者从事补写某些朝代或历史时期的地理志的工作,如补三国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等。补志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当代还有人从事(最近一部是《北齐地理志》),另外还有人进一步对这些补志的不足之处再作订补,这一工作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开始有人将眼光从个别朝代转移到整个历史时期,将历代地理志所反映的政区面貌连缀起来,编成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舆地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与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但无论是复原秦始皇三十六郡,还是做补志,还是编辑历代沿革表与舆地图,所有这些研究者,都还是将地理志认作某一朝代的经制,以之为指导研究的基本思路。换句话说,一般的研究者大都以为秦一代的政区就是三十六郡,而西汉一代的政区就是《汉书·地理志》里所载的一百〇三个郡国,还没有更深入地想到秦一代十来年,三十六郡未必一成不变。西汉一代二百年,其郡国变迁更是繁复。这种以为一个朝代只有一副政区面貌的认识与研究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通代的研究。这种认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存在,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极为珍贵的古地图,墓主的下葬年代在汉文帝时,其时的长沙国疆域,比《汉书·地理志》所载范围大得多,但受到研究时认识水平的限制,有些历史地理学者仍只能以《地理志》

称《郡国志》、《州郡志》、《职方考》)专篇。

随着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学家对政区变迁越来越重视。隋唐以后,在正史地理志之外,又出现有全国地理总志的体裁,比正史地理志内容更加丰富,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元丰九域志》以下,直至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都属于这一类地理总志的范畴。宋代以后,地方志的修撰形成制度,也记述了某一地的政区建置变迁,如果以民国时期为断限,这样的地方志至今大约还留下有万种以上。地理总志与部分地方志和正史地理志一样,也是研究政区变迁的另一类资源。此外,在政书一类典籍中,也有记录行政区划的专篇,如《通典·州郡典》、《通志·舆地略》与《文献通考·方輿考》,其中《州郡典》与《方輿考》的作用有似正史地理志。由于行政区划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几乎是无时不变,因此在上述所有这些地理文献中,不但只单纯记载当代的地理面貌,对前代的地理情况也有所叙述。所以就一般的意义说来,这些地理文献事实上也是历史地理文献。但从根本上说来,所有这些记述,多是某一代(有时只是一代中的某一时间断限)政区的罗列或某一政区在历代置废变化的记述,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

除了文字叙述以外,前代学者根据有关文献,曾编绘过一些历史地图集,如晋代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宋代的《历代地理指掌图》等,以反映历史上行政区划的这种变化。

第二阶段是个别的考证订讹。

虽然历史文献有着历代政区的记载,但如果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些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讹阙漏,而与此同时,还有些朝代的正史不列《地理志》,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各个历史时期政区面貌的复原。于是历代又都有一些学者对这些文献记载进行考证订讹式的研究,力图探索历史政区的真相。这种研究工作发展到清代的乾隆嘉庆之际,终于与研究河流水道变迁的学问一起,蔚为沿革地理之学。清代许多学者致力于这门学问,对正史地理志与全国地理总志以及有关政区的历史记载进行全面深入的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上述文献在文字方面的校勘订讹,解释文献记载中相互矛盾现象,恢复史籍的本来面貌。其中光是对《汉书·地理志》校订补正的专篇就有十数种之多。这些工作是真正意义

所载的长沙国为说。其实在这一阶段中,未必没有人认识到在一个朝代之中,政区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复原一个朝代的代表性政区,有各正史的地理志作基本依据,相对而言,难度较小(虽然也很难),研究一个朝代之中的政区变化过程,只有不成系统的零星记载可参考,难度很大。所以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问世时,政区变迁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历代大势的水平。

历代大势研究的局限性是明显的,《汉书·地理志》所列一百〇三郡国,只是西汉一代政区经过繁复变化尘埃落定以后的结果,光从百三郡国分布图上我们看不出政治过程对西汉政区的影响,也看不出政区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政治过程。我们看不出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叛乱之前的诸侯王国的实力,不能直观地理解汉文帝时贾谊所提的“治安策”在当时已经发生作用,因为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后,叛乱七国已经小而无能为了。《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们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极力想复原汉初与西汉中期的政治地理形势,在该书中画了好几张地图,但由于政区变迁的研究十分专门,这些地图除了西汉末年的百三郡国一幅外,没有一幅是正确的。

(2) 断代研究阶段

所谓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是指复原一个朝代之中的政区变化全过程,这也是姑且用之的提法,因为这样的研究至今充其量不过二十来年,尚未蔚为大观。但就在清代乾嘉时期,已经开始有人意识到,地理志并不能代表一个朝代的政区面貌,因为政区的变化几乎是无时不在发生,要全面反映这一变化过程,就必须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由徐文范所著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定稿于嘉庆八年[1803],但属稿很早,初稿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即已完成,因钱大昕于此年已为之作序),就想要理清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的政区变迁过程。这一时期是分裂时期,有的国家与有的朝代历时很短,如果全部弄清,则近乎是断代研究了,当然实际上还不完全是。要认识到行政区划是无时不变,而不是在一个时代里一成不变,也并不容易。清代虽然有聪明人已经意识到这一情形,但还有许多人没有悟到这一点,如王鸣盛就不明白此理,将《汉书·地理志》表现的西汉末年现象拿来批评《汉书》纪传记载的不实。

到了清末,这种想要透视断代政区面貌的要求更显迫切,吴增仅撰于

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三国郡县表》,后又由杨守敬补正的《三国郡县表补正》,可以说是一种断代研究开端的标志。该表虽未能详及逐年的变化,但在经过深入考证后,能列出魏、蜀、吴三国的每一代君主在位时的所有州郡县名目,以反映三国时期的政区变化情况,已属难能可贵,因为详细到这样小的时间段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均为前人所未见。与此著性质相类似的是王国维的《秦郡考》与《汉郡考》两篇著作。前者不但想确定秦始皇三十六郡是哪一些,而且试图研究秦一代的郡目。也就是说,想研究秦一代郡的数目与名目的变化,其结论是秦一代有四十八郡,并考证出这四十八郡的名称来。这里所谓的“秦一代”,已暗含断代研究的意味。当然受到史料的限制,王氏未能逐年地列出这些变化(当然有些变化受到原始史料的限制,是永远无法达到以逐年为尺度的)。《汉郡考》虽不是研究西汉一代的政区变化,但已接触到关键的问题,说明从汉高祖到文、景、武帝,汉郡数目也是变化的,而《汉书·地理志》对各代皇帝创建的郡数记载是错误的。这不但是修订史籍错误之作,还是朝代内部变迁的研究。当然王氏的研究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参考谭其骧《秦郡新考》与周振鹤《汉郡再考》),但这两篇文章却是振聋发聩之作,代表一种新的断代政区变迁研究的思路。

到20世纪30年代,以《禹贡》杂志编辑者与撰稿人群体为代表的新一代历史地理学者,也把眼光投向更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但关键性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际。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注意到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年代断限,二是增加总图。所谓年代断限就是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里大部分朝代的地图上都标明具体年代,如唐代是开元二十九年,明代是万历十年等,以表明这幅地图上的地理现象(包括疆域政区与自然现象),并非一个朝代的不变的面貌,而只是那一年的实况而已。这一做法过去从未有过,说明对一个朝代里头的政区变化已经开始重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来不及进行所有朝代的政区变迁全过程的研究,所以又采用了一个权宜的做法,就是在一些疆域政区变化较大的朝代里增加总图,这些总图表现一些关键年代的疆域与政区的大概,虽然比分幅图简略,但大致已能使读者明白该朝代在不同时期疆域政区的大致变迁。这些做法表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已经远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深入,研究水平已有很大提高。